

新文化史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专题讨论)

主持人:左玉河

[主持人语]1980年代以后,国际史学界发生了重大转变,新文化史应运而生。几乎与此同时,伴随着社会史与文化史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史学界相继复兴,社会文化史作为一种新兴学科和新的研究视角勃然兴起,与国际学术界兴起的新文化史遥相呼应。目前中国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呈现良好发展势头。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的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必要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缺乏深入专精的高水平著作(典范之作),且面临发展“瓶颈”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文化史研究大多尚停留在对社会生活现象的低层叙述和浅层描述层面,缺乏必要的研究深度。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状况,主要是因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缺乏突破性的理论方法。为了解决探讨制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瓶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与首都师范大学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联合召开了多次学术研讨会,围绕“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的新趋向”问题展开深入探讨。这里选载四位学者有代表性的意见,从不同的角度对西方新文化史及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反省和探讨,以期推进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深入。

[关键词]新文化史;社会文化史;史学研究;新趋向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7)02-0041-18 [收稿日期]2016-01-08

新文化史的兴起与史学的转向^①

王晴佳

(北京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1;美国罗文大学 历史系 新泽西州 葛拉斯堡罗 08028-2235)

最近三十多年来,新文化史开始在史学界盛行,它属于新史学的一种潮流,强调对社会的一种整体研究,但它本身也是非常零散的,无多少规律可寻。西方的史学传统与世界走向多元化为新文化史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而自下而上社会史的兴起也促进了新文化史的发展。

一、西方历史观念转变导致新文化史兴起

新文化史的兴起,反映的是历史观念之改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其产生还与西方史学的传统有关。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史家写作历史大多采用叙述体方式,用通俗语言表达,即讲故事。

古希腊的希罗多德算是西方的史学之父,当时他写的书即用了讲故事的形式,并在广场上宣读他的故事,有点像一位说书人,需要讲得精彩。于是叙述便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这个叙述性在西方源远流长,但

并不是每个人讲故事都能讲得很好。而希罗多德的《历史》之所以能传世,一个原因是其叙述的生动。希罗多德讲的主题是希波战争史,从公元前499—479年,但其兴趣很广泛,地中海地区的好多文明地区的历史都会归纳进去。从这个意义上讲,希罗多德不仅仅是西方史学之父,同时是一位文化史之父,已经把他文化的、文明的所有的零零总总的、枝枝蔓蔓也都讲足,足证他是文化史之父。在他之后二三十年有一个人即修昔底德,大家知道他也写了一本战争史,但其作品与希罗多德的有明显不同。修氏之作一般译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其他的没有什么异议,而希氏之作大家把它译成《历史》。其实“历史”这个词很难表达,在中文里它是单数,而在英文里它是复数,不仅仅是指希腊人的历史而已。有的节选编译本会把它翻译成《希波战争史》,但节编本的话语不太符合作者原意,因为作者的原意乃是要把整个他所知的历史都包括进去。

^①本文主要依据作者2014年6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讲座整理而成,感谢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陈恒的邀请并允诺此文的发表,并对陈恒教授的助手倪凯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德明先生的整理致以由衷谢忱。

以后在西方史学界,修昔底德的影响相比希罗多德更大一些。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修昔底德的治史方法仍为人称道。那么,为什么修昔底德的影响比较大?其中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即求真。所谓求真,即不依赖于虚构和想象,这是历史与虚构的最大区别,至少想象的成分比较少一点,虚构的成分几乎没有,或尽量没有虚构的成分。但是,从不虚构到完全表达真实,还要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要证明讲的东西是不是完全真实,需要花很多功夫。而希罗多德的写法,在史实考核方面不可能花很多功夫。为什么不能花很多功夫?因为他包罗万象,很多东西都是听来的,并且听了好几个版本,他把每个版本都讲,说不知道哪个版本更真实一些,要留给读者自己去评判。这个故事有这个版本、那个版本,听的人会感觉很有意思。那么,修昔底德就不太一样了,他虽然也有不同版本,但有一点,他基本上作的是当代史,有点像班固一样,班氏写的是汉代历史,而修氏写的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他亲历过的一个战争,尽管他得到了不公平待遇,但他写作时没有太多偏颇。修氏在写作中对事实的考证明显进了一步,在看到不同版本后,他会做一点比较以后再拿出一个版本来,并经反复比较确认是这个版本。那么第二点,若一个人只是写作近代文化史,如果像希罗多德那样多注重描述的话,解释的部分就显得不太重要。那么修昔底德正好相反,因为他要解释这个雅典如何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而从盛到衰及其原因。为什么这么一个领导希腊各城邦打败波斯帝国的雅典,会有这样一个境遇,会遭到如此重创。大家都知道后来马其顿的兴起被修昔底德认为是一大悲剧,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则是一更大的悲剧。该次战争的确旷日持久,前后连续打了30年,比希波战争还要长。所以修昔底德希望要解释,不仅为了保存记忆。相反,希罗多德主要是为了保存记忆。他说,在我们这个社会有很多丰功伟绩如果不保存的话,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东西都会被忘记。所以,西方人把希罗多德《历史》作品的诞生看作是和时间作对,时光流逝会让人的记忆变得模糊。他要做的是与时间抗争,要把时光磨损的东西减少到越多越好。那么修昔底德更多地是要作一个解释,他从经济的发展最后谈到政治文化的发展。因此,从方法上来讲,从主题鲜明及论证主题的彻底而言,希罗多德跟修昔底德是不能相比的。

但两者又都有一个共同点,这个共同点是什么?乃是其作品都有文学性。这一点值得注意,西方求真

的史学,与中国史学的求真一样,既要保证史实,同时又有文学性这一面。而且如果没有文学这一面,许多著作也就不可能流传下来了。因为如果文笔不好,作品就不能行之久远。从这个观点来看,文笔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史学是从近代西方传来的,但有趣的是,科学史学家包括兰克都是叙述的大师,或称讲故事的大师。那么西方史学的传统由此看来,形成叙述与解释的交锋,也就是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两种史学传统的交锋。二者之间交锋的初期,如到古罗马时代,基本上是修昔底德的传统更有吸引力。举例而言,就是波里比阿,大家都知道波里比阿是古罗马时代较著名史学家。其著作有叙述性,但他仍受到修昔底德的很大影响,他要提出解释:为什么罗马人在100年之内在古罗马形成很大的扩张,他有解释的愿望因此表现的非常清楚。有趣的是,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其比如,比较司马迁与班固。汉代之后,从影响上来说,班固比司马迁要大一些,包括刘知幾。刘知幾认为,班固的成就似乎大于司马迁。而现在我们一般都认为司马迁是最好的古代史家,但在古代,大家一般并不认为司马迁是最伟大的史家。而班固与司马迁的最大不同,就是班固写作的主题比较集中。古罗马的史学也相对有集中的主题,基本上以政治军事史为主,也以写作当代史为主,宏阔的世界史的写法比较少,因此古罗马史家看好修昔底德。同样,唐代的官方史学,以单个朝代史为主。唐代史家如刘知幾看重班固,因此也可视为是出于同样的道理^①。中西史学除了上述的相似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就史学体裁而言,中国先有编年体,然后才有纪传体,而在西方古典时代,编年体的影响不大,而叙述体则蔚为大宗。

西方古典世界结束、中世纪开始之后,编年体变得愈益重要。究其主要原因是那时流行使用纪年的方法——编年体即是将史实置于时间框架之中。我们看西方中世纪写的史学著作,会觉得很有意思,它常把《圣经》里的创世说作为开始,然后讲到作者所在的当代。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的《法兰克人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书中,格雷戈里从创世说开始,然后一路下来谈到法兰克人的兴起及其历史。中世纪史学对时间的重视,对近代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此种影响即是把这个历史的进程,首先分成几个时代。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作为一位最著名的神学家,其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就在此。他的《上帝之城》虽然是

^①刘知幾评论《史记》说道“每论家国之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所失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而对《汉书》则赞其“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参见《史通通释》上册,第19、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在说上帝之城 似乎是讲天国的历史 但他并未经历过天国 所以此书实际讲的是尘世之城、世界之城。换句话说 圣奥古斯丁所讨论的是天国到来以前的那些帝国 如亚述帝国、古罗马帝国等的历史地位。其意图是怎样把尘世的历史与天国的历史相联合起来。于是 他的《上帝之城》构成了一个世界史的大框架 至今这个框架的影响还是非常深远的。圣奥古斯丁历史思想另一个贡献即是强调历史进步观念。该书中提到不管历史如何起伏 最后会形成选民和弃民的区别 有一个选择过程。在世界历史的终结处 选民会进入天堂 世界历史也进入天国的历史。这种历史观基于宗教意识 又有空想的成分 与以前的历史观截然不同。西方古典世界流行今不如昔的历史观 所以有所谓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紫铜时代和黑铁时代。大家称颂最遥远、最古老的时代 而称颂这个最古老的时代似乎也相对容易 因为它史料也不多 可以补以充分的想象。因此 西方古典时代也与中国古代一样 “言必称三代” 称颂所谓的“黄金时代”。但是 基督教史观把这个东西颠倒了 把以往辉煌的文明都看成是为天国的到来作铺垫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亦即历史进步观念。这种进步观念并非一定是直线往上走 但最终走向进步、步入天国则坚信不疑。而且这种历史进步还把所有的文明都放在了里面 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姿态。在宗教改革之前 西方的基督教即天主教 而天主教(Catholicism)的一个意思就是普遍的 亦即认为其教义是作用于全世界的 放之四海而皆准。天主教传教士虽然也乐意学习各地的文明 如耶稣会士利玛窦等。但耶稣会士和其他教派一样 其目的是想把天主教义传给他人 比如在明代 像徐光启那样的重臣也信奉了天主教 可见耶稣会士的成功之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 基督教、天主教的历史观孕育了普世史、世界史 甚至现在的全球史也与此间接相关。这些世界史都展现一个有头有尾的发展 其中经过了各个阶段 相互递嬗 渐次发展。

历史发展的一个突飞猛进的时代 乃是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代之所以是一个极盛时期 是因为文化史得到了最昌盛的发展。文艺复兴时期 顾名思义 总体上文化事业非常发达。文艺复兴希图复兴古典文化 其中也包括复兴古典时代的历史观。文艺复兴人士对古典文化有一定的尊崇、有一定的崇拜。他们认为 从历史观上着眼 古典文明层次最高 然后往下走过了一个黑暗时代 于是就有古典时代今不如昔的概念。但同时 文艺复兴人士又认为历史在他们那

个时代又逐渐回升 那一回升是否能超过古典时代的辉煌 文艺复兴人士对此也不是特别自负。但不管如何 他们的历史观形成了这样的三段论:古代是光荣的时代 中世纪是黑暗的时代 而近代是一个新的时代。现在中国的世界史教材基本上都是受此影响 分期上划为古代史的研究 中世纪史的研究 近代史的研究。不但在中国 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尽管从现在来看 这样的历史分期 基于西欧历史 并不放诸四海而皆准。

文艺复兴时代的文化事业 有助文化史研究的开展 其目的就是展现历史宏观方面的发展态势。最著名的一本书为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 其中第一要素就是描述了一个时代 第二是对这个时代的特征作了三个主要概括 认为文艺复兴时代产生了三个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最先 引起了文化的复兴 然后带来了世俗主义 再往后就带来了个人主义。米开朗基罗和达芬奇都追求个人的成功。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利益 不管所谓的道德利益、国家利益。马基雅维利即是个人主义最典型的代表 他为统治者提供一种“治术”以获取利益 教授怎样治理国家的方法。伏尔泰《路易十四时代》也是此类文化史的代表作。他认为 在路易十四时代之前有几个时代的发展 关于这几个时代的辉煌都是从文化发展衡量的。

到了兰克所处的19世纪 文化史研究为政治史有所取代。19世纪的史家开始把民族国家的兴起看成是世界发展的一个主流。兰克史学确立了民族国家的史学研究范式 并用近代科学方法解释社会和历史的变迁 强调材料的爬梳和档案的使用 以求解释的确切。20世纪初年德国文化史先驱兰普勒希特挑战兰克的传统 强调文化史的重要 试图从文化心理的层面 整体勾画德国乃至近代欧洲历史的宏观走向。兰氏批评兰克的治史方法 认为那种专注史料考证的科学史学不具有积极、现实的社会意义。兰氏治史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 认为史家的责任不但是描述历史 亦须解释历史。值得一提的是 1986年 美国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召开纪念兰克逝世100周年国际研讨会 剑桥大学教授彼得·伯克(Peter Burke)提交了一篇论文 英文题为“Ranke: the Reactionary” 用中文来翻译就叫作“兰克——反潮流者” 或“反动者”。文中指出 在18世纪有一个文化史的传统 包罗万象 但到了兰克那里却变得狭隘了 又回到修昔底德的传统 注重解释 注重分析 注重史料 主题变得(过于)集中^①。

^①参见 Peter Burke, “Ranke the Reactionary,” *Syracuse Scholar*, 9:1 (1988), pp. 25–30.

伯克提交这篇论文时似乎想指出历史不能完全局限在政治、军事史,提倡新文化史的探索,不再重视分析历史的因果关系,而是注重铺陈、叙述历史的种种细节。

新文化史的出现,也与新社会史有关。其实1970年代以后的社会史,也可称之为“新社会史”。因为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探索解释社会的结构性变动,而是专注社会的一个现象抑或边缘团体,进行详尽的、微观的考察与研究。新文化史是从新社会史中间衍生出来的,其区别是研究对象的不同,但研究方法颇为相近。中国有句成语“坐井观天”,说的是观察的不够全面,但西方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史家,其做法都是眼光朝下,根本就没有兴趣“观天”,因此也谈不上观察的全面或是片面。此外,世界历史的走向不再以西方的崛起为中心,而是走向了一个多中心的发展道路。世界历史的这种多中心的发展态势,造成了历史观念的变化,引起了新的史学流派如新文化史的兴起。

二、新文化史值得关注的表现

史学家如果不再以解释社会宏观发展作为历史写作的首任,无意以小见大(即便是“坐井观天”),那么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归过去,亦即重拾讲故事的传统,这便是新文化史出现的重要变化。1979年,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英国著名历史刊物《过去与现在》上发表《叙述史的复兴》一文,来形容西方史家之回归传统,其中所关注的现象是以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兴起为代表的历史学转向。斯通看到,不少史家已经不再寻求对历史的变动作出合理的科学解释,而是满足于叙述历史的故事性。

那么,新文化史究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表现?其中之一是原来的历史研究要研究一个现象的发展,一般都会认为这是人的理性行为的结果。即人们做这件事情是由其理性支配的,当然这个理性肯定不是共同理性,而是个体理性。恩格斯曾经说过,有一个平行的四边形,你往这边走,我往这边走,到最后形成一个总体的发展,那这是一个理性行为的总体发展。对理性行为的重视,是在近代社会才开始有的。对照近代史学与传统史学的不同,传统史学常常会讲一些神迹,一种奇迹,以此来说明不可言说的、不可解释的一些现象。中国传统史学一直有这样的特点,比如清代所编的《明史》还把朱元璋的诞生说成是吉人天相,掺附了不少神迹^①。西方中世纪史学也记载了许多神迹。而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来看,人的理性行为才是人的最

后行为。比如,进行政治史研究的话,因果关系非常重要。以两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为例来看,一般来说,最大的争议也在战争起源问题。起源其实是因的问题,一般是先探讨这个因,然后再有这个果。而对果本身的描述则兴趣不一定很大,与现在新文化史的兴趣正好相反。研究因果的关系,就等于研究一棵树的主干的发展。

但是,理性行为往往不能清楚地解释这些文化现象和情感因素。如果放弃研究树干而研究树叶的话,那么每个个人在世界大战当中的体验与体会就成了关注的重点。这类研究便是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此类研究常采用一些口述史料,因为档案中缺少相关记载。但口述史料的性质很不一样。那些战士对那个时候所作的回忆,即其体验,在很多方面是感官的。如果从整个理性的发展出发,用理性主义来解释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这些口述史料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个人并不能代表总体。但新文化史却非常看重这些材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史学的转向就主要体现在此。

上面已经提到,强调理性行为,本身是近代文化的前提和产物。亚当·斯密《国富论》也许是一个较好例证。如果按照恩格斯所谓平行四边形的说法,个人行为是理性行为,而理性行为的总和促成了历史的进展。《国富论》强调个人可以追求自己的私欲是一大突破,体现了近代思维。因为追求私欲在传统社会都是备受指责的,像波兰、保加利亚等天主教传统比较坚固的社会,现在人们都还认为私欲应该被压抑,个人不能追求私欲。顺便提一句,为什么犹太人在欧洲传统社会一直遭受歧视,原因就在于犹太文化不忌讳追求金钱。他们愿意做收税者,帮领主记账什么的,所以普通欧洲人对犹太人没有好感,认为他们是帮助领主来搜刮我们的人。中国古代也提倡克己简朴,可以说所有的传统文明都是如此。但这一抑制私欲的传统从《国富论》开始有了根本改变,亚当·斯密不但同意追求私欲,而且有所提倡,强调个人追求私利是理性的考量,追求私利有利于整个国家乃至文明的发展。

论证私欲释放的最明显的一个文本是美国的《独立宣言》——提倡个人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与追求幸福的权利,即所谓三大天赋的权利,都十分重要。个人可以自己致富,可以寻求致富之道。这些私欲的发展,背后都是理性的考量。因此要分析一个世界的发展变化,就要做严密的因果分析。但如果是去描述个人行为的话,则常常是另外的角度,感官的层面就值

^①《明史·本纪第一·太祖一》中写道:“(朱元璋)父世珍,始徙濠州之钟离。生四子,太祖其季也。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比长,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志意廓然,人莫能测。”

得重视了。诸如《马丁盖尔的归来》、《屠猫记》等都是这方面的新文化史名著。相比之下,荷兰史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中世纪的秋天》出版更早一点,也正因此,约翰·赫伊津哈堪称新文化史先驱。该著创新之处很多,其中之一是有关侧重感官方面的描述。在作者笔下,中世纪是一个很美好的时代,但有点日薄西山,这个衰颓趋势在所难免,但又让人缅怀。该书比较有意思的是第一章,题目就叫“生活的激情”。此章有一个英译者注,注者说赫伊津哈此作,第一章是讲生活的各个方面,强调心态对感官的巨大影响。也许赫伊津哈的意思是心态或情绪之间存在的强大张力,就像桥梁因跨径而产生张力一样。言下之意是说,中世纪的生活在强大的对比中产生了强大的张力,因为生活就要对人的感觉,产生强大的影响。这个比方从词语本身开头,含义细腻逐渐展开,成为赫伊津哈叙事技巧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个感官就在于怎样感受中世纪的生活。新文化史讨论的正是感性认识,史家的叙述,主要锁定在感性层面,而不是理性层面。理性要重分析,感性则重描述,描述的越生动越好。从这个史学发展来说,即走到史学科学化反面,人的故事性又回来了,文史又开始不分家了。

所以,新文化史有几个标准:第一为选题的新颖,别人没做过,于是常常研究以前认为微不足道的题目;第二是采用描述的手段和手法。对西方人来说,这是回归传统,因为史学自中世纪晚期开始,即从属于修辞学。所以,史学的发展可以说是在不但强化叙述的成分。在1960—1970年代时,为了分析和解释社会的整体变动,人的活动退到了历史叙述的幕后。中国的历史教育到目前为止,还是以社会的整体变动作为我们学习的主要基调。所以,我们的历史著作往往显得特别的枯燥无味,因为总是讲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关系相应如何变化,然后社会关系的变化造成意识形态的变化,意识形态反过来对阶级的关系造成紧张,紧张以后造成矛盾,矛盾以后便造成斗争,斗争以后开始有暴力行为。然后文学艺术这一章,则常常在另一处。史家在讲了一大堆社会变化以后,再讲文学艺术的变化,于是整个叙述缺少整体感、缺少有机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有很多例子可以参考,此不赘述。

当然,新文化史被接受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娜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马丁盖尔的归来》(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在出版之后,一时受到的批评非常多。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天安门》(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的出版也受到了批评,因为当时的史学家大都不太喜欢这种以描述为主的历史想象,于是不太接受他们的作品。但这两位作者(娜塔莉·戴维斯和史景迁)后来都成为美国历史协会的主席,可见其学术研究取向最终得到了认可。对于新文化史著作的兴起和特点,可参考笔者《新史学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该书主要讨论新文化史,对新文化史的一些做法特别是中国学者的做法间或也有些批评。不过,批评主要在于西方新文化史的发展,是西方学术界感到规律性和因果关系不那么重要时才开始做新文化史。中国学术界如果全面效仿,难免有东施效颦之嫌。

历史学一直是一个强调概括的学问。当前的史学转向,从西方历史来说的话,概括的地方则变得越来越少了。以前是寻找规律,这个兴趣现在已经放弃了,但宏观层面的研究显然不是可有可无的。从历史认识论来说,新文化史与后现代主义有些重合,有些地方的转向都是对感官的强调,对于理性不是说完全忽视,但是对于理性的不重视也是客观事实,甚至对理性有点批判的态度,重视感官,重视批判。新文化史丢弃的是原来史学经世致用的部分(其实西方人经世致用的观念是非常强的,一直存在),放弃经世致用,实际上是史家的一种自杀行为;孤芳自赏会造成自我封闭,自我孤立,对社会的问题漠不关心。但吊诡的是,从事新文化史的史家却希望其作品有人读,于是才从事大众化、草根式的研究,因为如同前述,一味强调社会的总体架构变化,历史著作会形同八股,也会失去社会影响力。那么,我们需要怎样克服这个偏向?我的个人想法是,把一些新文化史的题材与那些大的观照、关怀结合起来,两者有所兼顾,做到见微知著,但又不刻意地解读、发现所谓的历史规律。

比如,笔者有朋友从事历史上“人参”问题的研究。从人参看明清的朝代更替,便有一个新的角度^①。清朝入关,满洲军队在其掌握的军队里面只有16%是满洲八旗,此外还有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有史家认为这么多人愿意为清朝打仗,并不是完全从道义上支持满族,而是出于对金钱的欲望。那么,满洲的钱从哪里来?买卖东北三宝是一个重要途径。人参贸易在当时非常重要,满洲人于是收入了许多白银。他们能靠卖人参赚钱,是因为明后期商品经济已较发达,物欲横流。明后期有点像现在的中国,在商品经济发达之后,一些男人追求享乐和性欲,长久之后又力不从心,需要进补。那时,人们发现人参和鸦片都能增强性欲,把它们视为

①参见蒋竹山《人参帝国:清代人参的生产、消费与医疗》(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春药^①。当今的美国也一样,吸毒很多都与性行为频繁有关。从种植、买卖人参来看满族的崛起,可以对明清换代提供一个新的考察角度。

再如,笔者现在研究筷子文化史,筷子是世界上最早的食用工具之一,早在7000年前中国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使用。16世纪以来,很多西方人到了东亚之后很快就观察到两个现象:第一个是汉字写法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第二个是中国人使用筷子进食。所以,从物质文化角度而言,除开儒家文化奠基了东亚文化圈之外,汉字和筷子也是极其重要的部分。筷子在东亚文化圈的地位重要,但样式和使用方式则有所不同。在日本,筷子短而尖,尖是因为他们吃动物蛋白较少,需要从海鲜中补充;尖筷子可以很轻松地剥掉鱼骨;短是因为他们喜欢分食制。而中国从宋代以后就开始“合

(王晴佳(1958—),男,江苏苏州人,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外比较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

食制”因此筷子较长。由是,讲东亚文化,就离不开筷子。而笔者还想证明,筷子的使用与东亚饮食和文化都有关系,同时也影响了文化和社会行为,形成与众不同的特征^②。

总之,新文化史在西方的兴盛,有其学术文化的特殊背景,折射出的是西方世界在全球影响的衰落、史家重拾过去、躲避现实的一个现象。中国的历史发展,从趋势上看,与西方世界的历史走向南辕北辙,不可同日而语。历史研究自然需要有发展,但发展的路向,则又可视各国、各地区的需要而调整。为此,中国史学界不应一味盲目跟从,如不了解其中的内幕,就难免东施效颦、削足适履。对历史发展主干的兴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崛起及其对整个世界的影 响,中国史学界自身应有一个清晰认识和解答。

社会文化史行进的四重维度

梁景和、冯 峰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48)

西方新文化史与中国社会文化史有相似之处,有一定的交叉性,也有明显的差异。国内学术界对西方新文化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认识和研讨^③。但进一步探讨西方新文化史、西方新文化史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以及两者的关系等问题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需作专门细致的研讨。国内社会文化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者,即与西方新文化史有一定关联的史学研究领域^④;狭义者,是中国本土萌生的并以社会文化史为旗号的史学研究领域。本文讨论的问题,主要以狭义的社会文化史为主,但很多地方还要涉及广义的社会文化史。社会文化史是一个在行进的主题,既要回首其研究历程,同时或多或少要窥测一下其未来走向,而重点关注的问题主要是团队重镇、理论方法、领域维度、史料文风等。

一、关于团队重镇

所谓团队,是指具有共同研究取向的集体;所谓重镇,是指具有一定学术影响的具体单位或机构。二者

往往是重合的。从国内广义社会文化史视域看,中国大陆社会文化史的主要团队和重镇大致有如下研究单位或机构^⑤:

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以社会通史为特色,编辑学术年刊《中国社会历史评论》,致力探索社会文化史的理论问题,而且在宗族史、医疗史、性别史等领域多有建树。南京大学历史系,专注于历史与记忆、概念史、城市空间、性别研究等诸多领域。复旦大学历史系,重点探索西方新文化史、社会性别史、知识史及其卫生身体史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主要研究性别史、戏剧史、城市文化史、知识分子史等诸多方面。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在社会文化史某些具体研究领域如评弹史、慰安妇史、妓女史、会党等民间社会史方面均有所建树。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持编纂大型“上海城市社会生活丛书”,对上海社会文化史作了多领域的研究和探索。厦门大学历史系,在社会文化史的理论方法以及华南与闽台社会

①有关明清社会吸食鸦片,参见 Zheng Yangwen, *The Social Life of Opium in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参见 Q. Edward Wang, *Chopsticks: A Cultural and Culinary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参见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精彩纷呈的新文化史》(《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1期)、《林·亨特与新文化史》(《史林》2007年第4期)、《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新文化史的回顾与反思》(《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6期)、李宏图《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江文君《西方新文化史简论》(《国外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等。

④主要指研究理论、方法、领域、视角、问题意识、叙述风格等有某些相似之处。

⑤这里是一般性的例举,而非精准的学术史探索。